

#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缘起、方法与理论论争

李艳霞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政治信任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关照和理论根基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内容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对于理论的分析仅仅停留在西方思想的引介阶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信任理论的挖掘和分析十分欠缺;在研究方法方面,许多学者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实证的,尤其是定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信任问题,但是在样本选择、数据分析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观点论争方面,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观点趋同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仍然处于思想积淀不足、理论分量不够的“研究领域初创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只有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加强学科融合,深化对理论元问题的剖析,加强对中国本土信任文化的挖掘,才能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不断发展。

[关键词]政治信任;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684(2011)02-0006-06

所谓政治信任在微观上主要指公民对政治体系相信和托付的心理;在宏观上表现为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的互动、合作及趋近的关系。作为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任历来是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政治体系获取其合法性的社会心理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政治系统理论、公民文化理论以及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托,政治信任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的理论问题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政治信任这一话题之所以备受关注,除其自身具有较强的理论张力与包容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近年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公民政治信任不断下降的事实。哈佛大学Ney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对政府信任持续下降的趋势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间的共同现象,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荷兰等国家都面临着相同的政

治信任不断下降的难题。<sup>[1]</sup>可以说,政治信任问题不仅与民主价值、政治心理、公民参与等政治学核心命题密切相关,更是衡量政府绩效的综合指标,是国家治理变革的文化与心理基础。我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问题的关注始于2000年之后。与西方学界相同,政治信任问题在我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也在于近年来我国公民政治信任感出现了一些变动的趋势。一项由中宣部、中组部策划,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四个民主党派参加,调查范围涉及全国经济发达、次发达、较边远三类地区中的50个大、中、小城市,调查内容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工作和期望、信任度。调查显示,只有部分民众表示信任党和政府的工作。<sup>[2]</sup>但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我国转型时期特殊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当代中国公民政治信任在水平、结构、发生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等

[收稿日期]2011-03-21

[作者简介]李艳霞(1976-),女,吉林辽源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公民文化。

方面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独特特征,这既为理论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素材,也为其提出了更为艰巨而迫切的任务。近年来,我国学界针对政治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且具有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细致分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政治信任研究领域的学术动态,预测理论发展的趋势,更能检视理论研究的不足,规划研究方向,进而促进理论研究的良性发展。

### 一、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缘起与现实动力

作为一切合作活动的心理基础,信任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始终,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学家西美尔认为:“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sup>[3]</sup>。政治信任作为“信任”这一庞大学科领域的分支,必然具有一般“信任”问题所具备的所有属性。此外,由于政治信任发生在普通公民与国家——这对在权力拥有方面不对等的主体之间,而且国家这一主体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国家机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因此,政治信任与一般的信任问题相比具有更广阔的理论视域。有学者指出,政治信任问题之所以在西方学术界兴起既有着特有的社会背景,又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其社会背景在于“批判性公民的成长”、“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危机”、“民主政治的危机”以及“全球化的拓展”。其理论资源包括“自由宪政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民文化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sup>[4]</sup>可见,政治信任这一话题上承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中接政治制度,下启政治行为,是一个具有极强理论包容力的研究领域。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虽然起步比西方国家较晚,但是考察所有与政治信任相关的研究成果,政治信任研究所依托的理论资源也无外乎上述理论成果,而批判性公民的成长,全球化的兴起也是我国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主要文化与国际背景。

我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大概在2000年左右开始,其中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培育途径的探索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信任问题原因分析的研究成果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信任这一研究领域在我国形成的主要动力在于近年来社会政治信任下滑的客观现实。如果依据此逻辑推断,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信任状况的客观发展将决定这一研究领域

的发展趋势;社会政治信任的程度、结构、生成机理等方面的变化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研究领域学术走向。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我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成果(以中国期刊网收录文章为标准)在2007年出现井喷式的增长,这与我国社会中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趋势呈现出高度的吻合。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群体性事件在我国一直呈上升的趋势,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已增加6万余起。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2009年)的统计,我国群体性事件在2005年一度下降,但从2006年起又开始上升,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6万余起,2007年上升到8万余起。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可谓是当代中国政治信任问题的集中体现。而近年来我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问题的研究趋势与我国社会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长趋势的高度吻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学界对于社会现实问题敏锐的观察与高度的关注。

### 二、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主题领域与研究方法

通过对中国期刊网收录的178篇有关“政治信任”文章的分析发现,我国学界近十年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回顾、引介与述评;政治信任的功能与外部影响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现状评估、当代中国政治信任问题原因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培育途径探索五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文章数量及所占总样本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研究主题	篇数	占总样本比例
理论的回顾、引介与述评	34	19.1%
政治信任的功能与外部影响分析	34	19.1%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现状评估	20	11.2%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问题原因分析	38	21.4%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培育途径探索	52	29.2%
总数	178	100%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我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领域,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培育途径的探索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信任问题原因分析的研究位居所有主题的前两位,占到总成果的50.6%。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

现状评估的研究与其他四个数量相对均衡的领域相比,研究成果最少,只占到总数的11.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社会中,包括理论界,对于我国政治信任下滑的事实虽然有着较高的敏感度,但是其结论的得出大多依据社会事件,网络新闻等感性判断。理论界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评估指标与完整的评估体系对当下中国的政治信任进行科学客观的测量与评估。

对各个研究主题内部进行更加细致地分析发现:首先,在近年来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中,学界对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信任资源挖掘不够。在理论回顾、引介与述评这一主题中,绝大多数学者对于政治信任理论的挖掘与分析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学者的信任与政治信任思想,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中“信任”的理论资源的挖掘明显不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任问题的分析只有2篇,只占这一主题研究成果的5.8%。其次,学界对于我国政治信任现状及其原因的分析的研究成果中,定量分析的成果呈现出显著地增长势头。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在对我国政治信任现状进行评估的研究中,有5篇是定量的评估,占有现状评估成果的25%,而这5篇文章中有4篇是在2009年发表的。在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问题的原因分析的成果中,有14篇是通过定量的方法分析影响我国公民政治信任的客观影响因素,占原因分析类文章总数的36.8%,而这14篇文章全部集中在2007年之后。政治信任作为公民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隐蔽性,社会中的群体事件以及网络舆论等社会现象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特定时期公民政治信任变化的大体趋势,但是很难系统、准确的反映出政治信任的细致样态,如果要探究造成当前中国政治信任问题的主要原因,仅靠学者主观的体验和观察,只能在宏观层面得出一些大而化之的结论。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现状及其原因的定量分析的增多不仅对我国政治信任的研究有着很好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于学术规范的日益重视。

以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研究方法为标准进行考察,近十年来,我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有理论综述性研究与经验研究两种类型。在以经验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144篇文章中,阐释性的研究76篇,占经验研究总体成果的52.8%,解释性的研究为

36篇,占经验研究总体成果的25%,无明确研究方法的文献32篇,占经验研究的22.2%。在解释性研究的36篇文献中,定量研究的占24篇,案例研究的占12篇。如果再以资料搜集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细致分类,运用已有数据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章有6篇,实地调研获得数据的18篇。在案例研究的文献中,运用历史文献进行案例研究的6篇,实地调研的案例研究6篇。可见,在对政治信任进行经验研究的成果中,大多数的学者采用的是一般意义的阐释的方法,或者说大多数学者更为关注政治信任问题的人文属性。而在定量研究的搜集方法上,大多数学者采用了实地调研以获取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界对于本土性政治信任问题的高度重视,学者们“坐在书斋里做实证研究”<sup>[5]</sup>的情况有所改观。在进行解释性研究的36篇文章中,有21篇文章有文献回顾与理论预设,这是我国学界研究不断规范的信号,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我国学界对于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但是,在实地调研获取数据的24篇文章中,只有3篇文章对于研究样本的抽样方法与选取原因进行较为系统的说明,这说明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三、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理论论争

在近几年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论文中,除了少量的理论引介与述评之外,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是围绕我国当前的政治信任的现实问题以及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展开的。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也形成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论争。

#### (一)关于政治信任的理论分类与现状评估

对于政治信任的类型,当代中国学者大多还是借用或延续了西方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范式,只不过不同学者根据其研究问题侧重于不同的理论维度。<sup>[6]</sup>有学者以学科为依据把政治信任划分为“心理学取向、社会学取向、文化学取向、管理学取向。”有学者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把政治信任划分为“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和服务性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合作性政府信任关系。”<sup>[7]</sup>有的学者在对西方理论界总结的基础上把信任划分为“基于人格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基于计算的信任、基于认

知的信任、基于知识的信任、基于情感的信任。”<sup>[8]</sup>也有学者以信任主体产生信任的动机为标准把政治信任分为“策略型信任”和“道德型信任”。<sup>[9]</sup>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众政治信任的水平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面对这一社会现象，中国社科界给予了迅速的理论回应。对于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的整体水平，有许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政治信任的危机”与“政治信任的风险”，并且这种危机和风险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将会对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带来巨大的威胁。有学者则认为虽然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政治信任危机的断语不可轻易作出。”<sup>[10]</sup>要对当前的政治信任进行细致、客观的分类评估才能做出准确客观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危机是所有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现象，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政府“履约”能力的下降，进而造成了公众的对政府“应然”的期盼与“实然”的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政治不信任也由此产生。<sup>[11]</sup>如果从微观的视角观察，大多数学者赞同李连江教授对当代中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基本判断，即政府的层级越高，民众对其的信任程度也越高。也有学者对我国政治信任的“央强地弱”现象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以地方为中心的政治接触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sup>[12]</sup>总之，虽然程度不同，但几乎关注这一问题的所有学者对中国政治信任水平下降的事实都持一种肯定的态度，都认为政治信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中一个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 (二)关于政治信任的生成机理与影响因素

政治信任的生成机理与影响因素是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争论较多的学术领域。关于政治信任的生成，西方理论界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一种是以阿尔蒙德与维巴、英格尔哈特、帕特南、福山等为代表的文化论者。在文化论者看来，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主要指外生的，来自于政治制度之外的因素，或者说来自于长期存在的，内化于文化规范的一套信仰，人们的信任最先产生于亲密圈子的特殊信任，在慢慢扩展到对陌生人的社会信任，然后在投射到政治领域。也就是说，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是决定作用。与文化论者相对应的是以科尔曼、达斯古

普塔以及哈色林顿为代表的制度论者。在他们看来，政治信任来自于政治因素本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制度绩效，在这一问题上，制度论者与文化论者的结论截然相反，帕特南(文化论的代表人物)认为信任可以生成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制度的绩效，而制度论者则认为政治信任是制度绩效的后果而不是原因，人们的政治信任来源于人们对制度绩效判断的理性选择。

国内学者对于政治信任生成机理的研究也大致围绕这两个维度具体展开。在研究目的方面，许多学者以当代中国为考察对象，通过具体的调研与数据的统计来验证、修订或补充西方学界关于政治信任的理论结论。有学者通过实地调研验证了政治信任是社会信任的原因而不是结果的这一制度性结论。<sup>[13]</sup>也有学者认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对政府透明度的认知、政治效能感以及对官场道德的评价等理性因素是影响人们政治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sup>[14]</sup>有学者以社会NGO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调查验证了，无论在计算型信任、关系型信任还是制度性信任方面，非政府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信任都与政府的能力、沟通、制度的公正与正义有着密切的线性相关关系。也有学者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以“人性善”假设为基础的制度设计，虽然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会形成“制度性倒逼”，以至于在此制度设置理念引导下的政治实践需要靠虚假行为来支撑，进而造成失信于民的后果。<sup>[15]</sup>除了以上以理性选择为基础，以制度为视角检视、验证或修订西方有关政治信任的理论成果外，也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政治信任问题，如有学者以实地调研的方式试图检验媒体，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塑造大学生政治信任中的作用。经过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印刷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有促进作用，而网络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则会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任的下降，并且证明了大学生的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up>[16]</sup>此外，还有学者利用已有的统计数据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在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中，制度和文化的文化在解释政治信任这一社会现象是均具有显著意义，而这并不是互斥的关系。而且，政治权威价值观：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对于亚洲八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sup>[17]</sup>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西方学界文化论的核心

观点。

### (三)关于政治信任的外部影响

如果说关于政治信任的生成机理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以政治信任作为因变量的研究,那么关于政治信任外部影响的研究就是把政治信任作为自变量的研究,也就是侧重分析政治信任对政治生活,以至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作为体现政治体系和公众之间内在联系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信任是决定一个国家政治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这已经是被各国政治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公认的命题。当代中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意义和价值同样有着相同的认知,这也是近年来政治信任研究迅速升温的价值认知基础。就学界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来看,当代中国学者对于政治信任外部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政治信任与群体性事件、政治信任与公民政治参与、政治信任与国家或地方的治理水平三个核心议题展开。

在针对政治信任与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中,所有学者都充分肯定了当代中国公民对政治体系信任度下降与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紧密内在联系。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本身就是公众政治信任危机的外在表现,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就在于“以政务透明取信于民”、“以有承诺的公共服务绩效取信于民”、“从对地方政府负面特征和不当行为的严格问责和严肃惩戒来取信于民”、“以发展民主和扩大参与来取信于民”。<sup>[18]</sup>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出现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不信任具体表现为:利益型政治不信任、官员腐败型政治不信任、决策失误型政治不信任、“假大空话型”政治不信任。<sup>[19]</sup>也有学者通过对一个典型个案的发生与处理的深入观察与细致分析指出,乡村社会中群体性事件与政治信任的流失有着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而在当代中国的乡村,平息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仍然主要依靠熟人社会的社会信任而不是制度化的政治信任。虽然熟人社会的信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信任的不足,但是熟人社会的信任仍然有许多功能性的不足。<sup>[20]</sup>在公民的政治参与方面,多数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肯定了政治信任与公民参与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不仅体现在城市居民的选举,也体现在农村的村民选举之中。<sup>[21]</sup>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村民对村委和乡政府的信任与其参与村委会选举行为之

间仅存在微弱的关联,其中,村民对村委的信任与其参选行为存在正相关,而村民对乡政府的信任与其参选行为则呈负相关。<sup>[22]</sup>在治理水平方面,有学者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世界银行考夫曼开发的治理水平指标体系提供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与相关分析等方法的得出结论:政治信任与政府治理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政治信任有助于政府治理绩效的提高。<sup>[6]</sup>此外,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普遍信任的形成有利于公民政治知识的形成以及有关政治的讨论与协商,信任社会资本是公民政治知识成长与形成的内源性基础。<sup>[24]</sup>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对于政治信任研究的主要动力是现实的,而非理论的需求。这完全符合知识发展的根本逻辑。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关注会不断加强,成果数量也会不断增多。我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实证的分析,而且实证研究成果在近几年不断增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学界越来越重视本土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也越来越注重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强烈的现实需求、敏锐的学术感知、日趋规范的学术研究使近十年来我国政治信任研究领域呈现出良好态势,这也是推动这一学术领域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当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我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研究也存在着许多亟待完善的方面。如学术研究视野狭窄,学科融合有待拓展;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传统资源挖掘不足;思想碰撞乏善可陈,学术观点流于表面。总之,政治信任研究之于中国仍然是处于初创时期学术领域,只有不断地扩宽学术视野,强化理论支撑,规范学术研究,挖掘本土资源才能不断提升我国政治信任的研究水平与层次,促进这一研究领域的成熟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1]Ney, Joseph S. Introduction: The Decline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Ney, J.S, Zelikow, P.D. and King, D.C.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程倩. 政府信任关系: 概念、现状与重构[J]. 探索, 2004, (3): 35-38.
- [3]西美尔. 货币哲学[M]. 陈戎女,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4]上官酒瑞,程竹汝.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与社会背景[J].江苏社会科学,2009,(1):126-132.
- [5]肖唐镖,郑传贵.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的状况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2):11-17.
- [6]孔凡义.信任、政治信任与政府治理:全球视野下的比较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9,(10):123-126.
- [7]程倩.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与缘起[J].社会科学研究,2005,(4):17-22.
- [8]向长江,陈平.信任问题研究文献综述[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39-42.
- [9]周治伟.政治信任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7.
- [10]梅祖蓉.中国政治信任水平测度指标及现状[J].云南社会科学,2009,(2):7-11.
- [11]陈明明.为什么政治信任成为一个问题[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4):55-56.
- [12]叶敏,彭研.“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3):50-58.
- [13]梁江,王娜.政府型制度信任——对天津和乌鲁木齐两市社会信任水平的抽样调查[J].公共管理评论,2004,(2):55-72.
- [14]陈明哲.政府信任感的实证研究[J].湘潮,2008,(7):48-50.
- [15]郝宇青.政治制度设计理念与政治信任缺失[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4):64-65.
- [16]王正祥.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J].青年研究,2009,(6):64-74;柯洪波.腐败与公众信任:基于政府官员的调查与解读[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6):74-80.
- [17]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5):79-86.
- [18]邹育根.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之特点、趋势及治理:政治信任的视角[J].学习与探索,2010,(2):66-69.
- [19]刘孝云.群体性实践中的政治信任问题分析[J].探索,2009,(5):76-79.
- [20]邱国良.政治信任: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以仲村5·31事件为个案[J].社会主义研究,2009,(3):71-74.
- [21]余敏江,梁莹.政治信任与公民参与——内在关联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08,(5):121-125;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4):165-187.
- [22]胡涤非.村民政治信任及其对村级选举参与的影响:基于广东省惠州市P村调查的实证研究[J].暨南学报,2010,(3):156-126.
- [23]梁莹.现代政治知识成长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实证层面的解析[J].人文杂志,2007,(6):58-67.

(责任编辑:牛君)